

DOI:10.13718/j.cnki.xdsk.2025.03.005

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研究专题

引用格式:文丰安,刘雯琦.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历程、鲜明特色与时代价值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59-70.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的发展历程、鲜明特色与时代价值研究

文丰安¹,刘雯琦²

(1.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2.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工作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起始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巩固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调整发展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在领导乡村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乡村发展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土地问题,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各项举措。新时代新征程,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乡村发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23;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5)03-0059-1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乡村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农业再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同时国际环境复杂严峻,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越是应对风险挑战,越要夯实‘三农’工作基础。”^[1]乡村发展对于城乡共同繁荣和国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分重要。“乡村作为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日益呈现出利益分化、规则多元、价值丧失等公共性消解的特点,这不仅与现代社会发展对其产生的冲击影响有关,还涉及到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退场与再嵌入。”^[2]要保证乡村的繁荣发展,必须坚持党对乡村各项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发展的百余年历程,凸显了党的领导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发展成就显著,乡村振兴取得积极成效,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三农”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出台各项政策保障粮食供给,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实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振兴目标。2019年1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乡

作者简介:文丰安,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2024ZDZJ57),项目负责人:文丰安。

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坚持党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3]。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促进乡村发展,努力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党员干部培训,致力于推动乡村融合发展。然而,乡村发展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国际环境严峻复杂致使我国发展面临的难以预料的因素增多、乡村基础设施落后、产业融合发展不够充分等。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发展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贯彻和落实党对乡村工作的部署,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力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近年来,围绕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这一主题,学界主要从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意义、现实挑战和优化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其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意义。文丰安认为,“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是以党的凝聚力推动乡村振兴的稳步发展,是依靠党组织的自身优势,建立起乡村组织网络,直达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4]。杨莹认为,“基层党组织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将扶贫资金作为杠杆撬动乡村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市场资本进入乡村发展产业”^[5]。汪俊玲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6]。张桂文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也推进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中国化”^[7]。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推动乡村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意义重大,党在探索历程中也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作出了丰富和发展。

其二,关于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李冬慧认为,“村级党组织要更新农村基层治理观念,探索如何将‘民主和有效’的理念融入具体实践中,是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挑战”^[8]。蒙慧等认为,“改革开放后,很大一部分农村资本流出,基层党组织不再具有对农村资源的绝对控制权,更多地依靠自留党费和国家财政维持组织运转,这使得在开展活动时左右为难。总的来看,随着经费自给能力衰弱,其权威性也相应受到侵蚀”^[9]。刘立光认为,“有少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学习培训、调查研究、政策落实、服务群众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严重影响乡村振兴进展,成为基层党组织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0]。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面临的挑战,集中在党的自身建设和能力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经费问题。目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经济社会平稳运行难度加大,党组织领导乡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党组织领导乡村工作的实效性以及如何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等,需要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当前乡村发展的新情况,提出新的策略和措施。

其三,关于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优化路径。刘涛认为,“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保障制度、自身制度等建设,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时代性,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党的领导效能”^[11]。鲍旭源等认为,“要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在农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中设立基层党组织,丰富‘一村一支部’的单一垂直体系,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12]。周定财认为,“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全面振兴阶段要集聚基层力量,牢牢抓住‘三治’,推动‘三效’转化为乡村善治的动力源泉,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13]。郗德才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为农村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发展模式、发展方向等把脉。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针对目

前村级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存在的问题积极制定解决方案,让村集体经济回归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参与的所有制形式,让村集体经济真正为村集体发展服务,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领头羊”^[14]。王凯等认为,“要形成一体化从严管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管理模式,组建合乎党员、群众心意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打造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15]。张琦等提出,要“以高质量发展要求为指引,遵循乡村空间配置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产业发展规律,走以人为本、提质增效、绿色引领的新时期乡村振兴之路”^[16]。党组织领导乡村融合发展,需要重视乡村各方面的建设,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尤其重视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优化领导方式。

学界对于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集中在党组织领导乡村融合发展的意义、现实挑战和优化路径三大方面,但在经验总结与特色研究方面还有一定缺失,大部分文献在研究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程之时,一般都侧重于某一具体时间段的研究,缺少共性经验部分的总结。

本文的创新价值在于,从回顾党在各个时期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程中,总结出具有共性的经验,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新实践提供借鉴。本文从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史实和历程入手,通过党在不同时期出台的有关乡村发展的文件及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史实践,总结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史经验,并与当前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新实践提供新借鉴。

二、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乡村的建设和发展,始终坚持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带领乡村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起始阶段(1921—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土地革命保障农民权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通过开展土地革命保障农民利益,也在其他方面努力推动乡村发展。建党初期,党在实践中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初步探索。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17]。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党制定了《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联合农民阶级,逐步形成工农联盟。1925年6月,毛泽东创建了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共韶山支部,以“庞德甫”作为党支部的代号^[18]。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相关实践,颁布多个“土地法”以完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将土地还给农民,对乡村治理的路径作了积极探索。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首次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符合时代的科学判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5月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意味着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充分保护农民利益,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根据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实践,将土地革命的总路线概括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1317]。各解放区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通过兴修水利、发放贷款、组织互助等方法,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党还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大量的制度探索,在农村建立了青年团、妇救会等群众组织以取代传统的宗族组织,成为更广泛的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19]¹⁴²⁷

(二)巩固阶段(1949—197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特别是乡村积贫积弱。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重点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迎合了农民意愿,提升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及对乡村治理的感性认识,各地划分农村人员的成分,有意识地吸纳思想先进的中农、贫农成分到土改工作队、农会组织中参与乡村治理,初步释放了基层治理潜力。”^[20]1950年到1952年进行新的土地改革,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地位。195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不能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要同时激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国家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逐步将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支配体系,最终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按照“三步走”的规划组织乡村和农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组到建立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成立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总的来看,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全国农民大体有20%~30%过着略有结余的生活,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党领导农民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从1961年到1964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注重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比如兴修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以保障基本农业生产。在城乡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以工业为主导、兼顾城乡发展的思想,强调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注重乡村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初步普及教育,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革除农村社会陋习,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开展“扫盲”运动提升农民知识文化水平,转变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在各方面推动乡村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发展完善和巩固,带领广大农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发挥强基固本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三)调整发展阶段(1978—201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城乡改革改善农民生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起步于农村,发端于土地,安徽小岗村的实践是农村改革的基层探索,推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认识城乡关系和审视农村工作,大力推进城乡改革,促进城乡互动,提出“农村党组织要积极带领群众勤劳致富、共同致富,坚持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1]。1982年至1986年,中央出台5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提升,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继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把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扭转城乡发展差距。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费,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减轻了农民负担。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从禁止流转走向开放流转。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强调要使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这一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进行了调整和规范,由按生产大队设置组织机构改为按行政村设置组织机构,大幅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力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四)全面建设阶段(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持续发力,科学组织领导乡村工作,推动乡村更好更美丽地发展,坚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乡村全面振兴,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农村党支部在农村各项工作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22]。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并行,乡村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民收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3]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强调加强农村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2019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旨在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和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聚焦产业促进农村发展、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指导等八个方面。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2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8683元提高到2023年的21691元,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国美丽村庄的数量从2012年的108个增加到2023年的256个,乡村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纵观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组织领导乡村的各方面发展。从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总结出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鲜明特色。

三、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鲜明特色

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取得了丰富经验和重大成就,呈现出鲜明特色,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美丽乡村建设行走在路上。回顾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百余年历史,可以从中总结出具有共性的鲜明特色和经验。

(一)党的领导是乡村发展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必须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主心骨作用。回顾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人民才实现了独立和解放;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农民发展集体经济,农村生活才得到了改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组织领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根据城乡关系新变化,在关注乡村发展的同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在乡村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领导保证了乡村发展的政治方向,使得乡村的农业发展始终走在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之上,让村民能够充分享受到乡村发展的积极成果。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让村民共享乡村发展的成果,才能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和支持。

坚持党对乡村工作的领导,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可忽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注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同武装斗争相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体制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等。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中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乡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着组织协调的作用,将党对乡村工作的规划落到实处,组织群众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在基层,因而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协调机制,对于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25]乡村基层党组织也起着服务群众的作用,乡村基层党组织扎根乡村,与村民紧密联系,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村民的诉求和愿望,以相应措施解决村民的问题,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为乡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广东省阳西县沙扒镇渡头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认真做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以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推动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基层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标杆^[26]。

坚持党对乡村工作的领导,也要重视乡村基层党员队伍的建设。党员在乡村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够为村民们树立榜样,通过榜样的力量带领乡村形成积极奋进的良好风气。党员也担负着组织群众和宣传政策的重任,通过深入群众之中、帮助村民解决困难来建立村民对党的信心,凝聚力量推进乡村融合发展。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党支部书记袁样生始终认真负责,带领本村发展优势产业推动乡村经济收入增长,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在他的影响下,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乡村基础设施和环境都得到了优化^[27]。基层党员也是村民的代表,能够反映村民的利益要求,部分基层党员在村组织中担任职务,带领村民推动乡村发展。

(二)乡村发展过程中要紧紧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1922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农民的生存权问题,关心农民的生活和利益。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是民主的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党通过各项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积极成果,助力推动乡村振兴。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党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确保城乡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例如北京市和江苏省都通过投入建立乡村医疗基础设施和提高乡村医疗水平,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或县级以上医院的服务,足以体现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有关乡村发展的各项工作。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只有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够取得各项事业的成功。

人民群众是乡村发展的主体,乡村发展需要紧紧依靠村民。村民是真正生活在乡村之中的主体,乡村的发展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生活在乡村中的村民才最了解乡村的具体情况,才会明白乡村发展的过程缺乏什么、乡村发展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最有发言权,这取决于乡村振兴的阶段性成果是否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使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8]没有村民参与、不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乡村发展,最终会偏离乡村发展的正确方向。村民也在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自已的作用,比如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的返乡创业大学生通过带领村民发展茶产业引领本村发展^[29]。城乡融合发展说到底“人的融合”,人是城乡融合的目的,让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实际情况选择留在乡村还是城市,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推动乡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取得乡村振兴的新成就。

(三)乡村土地政策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

土地资源是乡村发展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关注土地问题,科学合理的土地政策能够较大程度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潜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繁荣发展。从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看,不论在任何时期,因地制宜调整土地政策都能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巩固了红色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人心;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多方力量,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局在沂蒙地区组织领导实施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推动了沂蒙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巩固了新生政权;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帮助。新时代以来,党更加注重土地资源利用,持续完善用地政策,不断优化土地管理,创立了“三权分置”制度,促进了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城乡融合不断发展,保持乡村土地数量、充分合理利用乡村土地资源尤为重要。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土地资源少、人口多是一个客观现实,要保障众多人口的粮食供应必须依靠土地。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拥有足够的耕地、提升耕地的质量,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土地资源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尤为重要,乡村中的一二三产业发展都需要土地,乡村的产业振兴和生态保护都依赖土地资源。乡村中的土地也是农民情感的寄托,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十分深厚,土地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许多农民希望依靠土地和自己的劳动过上更好的生活。要特别重视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合理制定土地政策,才能更好地组织领导乡村融合发展。

(四)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与时俱进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乡村治理实践和党的历史经验表明,乡村文化建设没有固定模式,是立足时代特点、根据发展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30]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领导乡村工作,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矛盾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党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科学认识。建党之初,党作为新生力量还较弱小,在乡村工作方面缺少相应经验,党扎根乡村从实践中探索乡村发展道路,根据乡村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兼顾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形成城乡互助思想,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提出工业支援农业,工农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我国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党高度重视“三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塑城乡关系,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工作,始终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根据时代要求作出相关决策,提出最适合乡村发展的政策。在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方面,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再转移到城市,从城乡兼顾互助到统筹城乡发展再到城乡一体化,都是党根据不同时期城乡发展情况适当调整城乡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表现。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组织领导乡村发展,不断为城乡协调发展作出努力。

以上特色内容都是从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共性的经验,并不是只根据一个阶段或是个别乡村发展的情况总结出来的,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推动乡村发展的实践经验的。

四、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当代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弥足珍贵,能够指导党当前乃至未来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实践。“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31],当今正在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从中得到相应的启示,推进“三农”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一)加强党对乡村工作的领导

第一,要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首先,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忘初心,在乡村发展中始终将最广大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获得村民的信任。其次,通过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学习有关乡村发展各方面的知识,提升领导乡村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最后,党要提高对农村工作进行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能力,站在国家发展全局高度看待城乡关系,明确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党可以组织队伍到农村基层考察调研,从乡村融合发展的实践之中及时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念和方法,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文件,指导乡村工作实践。

第二,要抓好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还需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引导农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并加强对各类农村组织的领导,确保农村工作方向正确。”^[32]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领导乡村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群众组织力,通过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并用于指导乡村发展,深入基层调研村民的利益和诉求。基层党组织也要积极学习新兴技术,探索党建带领乡村发展的新模式。例如陕西省岚皋县佐龙镇通过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的模式,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格局,发展了当地特色的富硒茶叶产业,帮助村民就业和实现收入提高,缩小了和城市的发展差距,助力了城乡融合发展^[33]。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统战有利于凝聚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乡村资源,是我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法宝”,也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将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上层和基层的有关成员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重要作用”^[34],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凝聚更多力量。目前乡村之中可能仍旧存在基层党组织不完善、不纯洁的情况,党要始终重视乡村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为继续组织领导乡村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要加强乡村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发展的积极性。党员应“发挥榜样带动作用,持续推进‘领头雁’工程建设,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少数’,不断强

化村两委班子力量,锻造一支靠得住、信得过、顶得上的干部队伍”^[35]。“其中,理想信念问题最为关键,但又以能力为重要支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36],要注重党员理想信念以保证乡村发展方向的正确,也要注重党员能力的培养,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助力。在加强原有党员培训和教育的同时,也要吸收乡村中有知识、勤劳致富的村民加入党员队伍。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37]“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本质上是群众路线制度化践行的过程,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找回群众’”^[38],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关注乡村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村民进行有关乡村发展以及乡村日常生活方面的交流,深入了解村民的诉求和愿望,组织领导村民不断推动乡村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党组织要保障村民各方面的利益,深入调研农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努力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在决策时要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根据最广大村民的利益要求提出乡村发展的具体措施。基层管理者要转变思维,积极为农民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良好环境,培养村民话语表达的意识,充分了解和调研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引导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例如湖南省沙洲村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共同商讨乡村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建设和乡风建设等问题,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党组织和村民上下一心,共同推动乡村发展^[39]。要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村民成为乡村发展中的主体,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此外,“随着乡村建设逐步推进,外出务工农民陆续回到家乡,由于其本身具有相对于留守居民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可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其在乡村建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在乡村建设中发挥自身才能,带动乡村发展”^[40]。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要保障城市居民和乡村村民的权利,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更需关注乡村长远性民生,通过构筑以人民长远利益至上的大民生观,统筹城乡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以及权利公平的制度体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让农村居民有充实的获得感”^[41]。

党组织要在本土村民中发展一定数量的党员,同村民们保持密切联系,聆听村民诉求。“本土村民之间有着天然的社会和情感联系,村民党员在熟人关系的基础上更容易做好群众工作。此外,吸收村民成为先进分子和党员,其更能够想农民群众之所想、急农民群众之所急,建立党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强韧关系。”^[42]也要加强对村民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广泛依靠村民,引导村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

第一,保护耕地资源,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民以食为天,坚守住底线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保障国家安全。在耕地保护上,党采取各种措施从各个方面加大保护耕地的力度。比如,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破坏耕地的行为进行处罚,遏制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具体责任,有效保护耕地资源。借助科技手段,积极调动各方力量保护耕地资源,“积极推进数智赋能耕地保护,并鼓励民众、科研人员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43]。

第二,实行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我国乡村中外出务工人员数量较多,大量劳动力外出造成土地闲置。想要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带来的效益,实行土地“三权分置”是合理且有效的,既保护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又有助于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在实行土地“三权分置”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土地资源,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三权分置”相关事项,明确土地流转程序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权界定和执行标准,减少流转过程中的矛

盾。同时加强对土地流过程的监管,确保土地流转合法合规。“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是打破城乡要素流动障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44]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土地资源基础,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方面,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让土地资源带来收入增益。“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稳定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激活宅基地的财产属性是土地振兴的重要内容。”^[45]农地入市模式的核心,就是将宅基地置换后腾空出来的土地,用作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大大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既有利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让农村资源要素活起来,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经济融合。例如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积极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盘活乡村土地资源,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46]。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过程中,要制定相应规划,明确流转土地的用途,保证土地流转程序规范,在保护村民和乡村集体利益的同时充分尊重经营主体意愿。

(四)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领导乡村发展

要坚持实事求是,根据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组织领导乡村发展。只有清楚了解当下的实际状况,才能据此作出及时调整,不断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新实践。

第一,深入乡村发展广大实践之中,从实践中形成对乡村发展工作的认识,紧扣乡村发展工作中的难点和痛点制定相应政策,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面临众多新挑战和新问题。当下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要精准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推动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在乡村发展方面,主要问题有经济体制不完善、村庄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等。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不同地区有不同状况,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色,及时调整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政策。例如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在政府扶持之下依据当地特色开发独特的旅游项目,推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47]。

第二,与时俱进加强各方面学习,丰富自身在领导乡村融合发展方面的知识和能力。首先,要加强理论方面尤其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党组织要加强理论方面的学习尤其是关于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理论,通过举办讲习班等多种形式让党员进行深入了解和学习,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更好地指导推进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其次,加强对新兴科学技术的学习,在乡村发展工作中引入数字技术等新技术,为乡村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乡村数字治理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依托互联网平台实施的一种开放、协同和创新的治理范式。”^[48]数字技术在乡村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重点对乡村干部和农村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数字化设施设备的使用能力培养,提升乡村地区群众的信息获取、收集、加工等能力”^[49],以便于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除此之外,还有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等多种新技术,都需要不断学习。近年来,部分乡村的基层党组织将数字技术和“智慧党建”有效结合,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效率,帮助农村基层党组织作出科学决策,这是党坚持与时俱进取得的成果。如今我们正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始终关注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为乡村发展提供正确指引,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新形势新挑战之下更好地推动乡村融合发展。

五、结 语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从多个方面对乡村发展作出了规划,党的组织领导始终是乡村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时代在变化,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也面临新的情况:一是国际局势的变化给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影响着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二是数字技术等新兴科技的发展给乡村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数字技术等新科技如何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成为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三是党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还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对乡村振兴的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面对这些情况,要继续从过往历程中不断总结,既要保持党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的优良传统,又要根据时代和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第一,要不断从组织领导乡村发展百余年历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指导当今和未来关于乡村工作的实践。第二,要始终关注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注重乡村基层党员队伍的建设,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凝聚力量继续领导乡村振兴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第三,要根据当下的形势和变化创新领导乡村工作的方式,比如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推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5-02-24(1).
- [2] 陈华平,陈秦. 党建引领乡村公共性重建的理论渊源、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47-59.
- [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1).
- [4] 文丰安. 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1.
- [5] 杨莹.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J]. 人民论坛,2020(23):108-109.
- [6] 汪俊玲.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J]. 红旗文稿,2018(15):31-32.
- [7] 张桂文,王子凤.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及实践经验[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6):86-103.
- [8] 李冬慧.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实践:功能嬗变与治理趋向[J]. 探索,2020(3):107-117.
- [9] 蒙慧,姜跃辉. 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4):53-60.
- [10] 刘立光.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探析[J]. 湖南社会科学,2022(3):37-44.
- [11] 刘涛.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功能定位、实践逻辑及时代任务[J]. 人文杂志,2021(8):10-18.
- [12] 鲍旭源,李红军. 乡村建设行动下农村基层党建的优化向度——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视角[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5):13-22.
- [13] 周定财.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5):41-48.
- [14] 郝德才.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J]. 农业经济,2022(2):66-67.
- [15] 王凯,马华. 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行动策略[J]. 中州学刊,2024(9):82-89.
- [16] 张琦,李顺强.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内在要义与提升对策[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68-77.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1.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31.
-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7.
- [20] 谷康,王怡舞,王浩. 乡村景观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及动力学机制研究[J]. 中国园林,2024(2):57-63.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56.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84.
- [2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1).
- [2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5] 张瑜,熊建生. 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探索[J]. 广西社会科学,2023(7):19-26.
- [26] 徐旭.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规划研究——以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乡村振兴规划实践为例[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4(10):10-12.
- [27] 李文荣,陈建伟. 城乡等值化的理论剖析及实践启示[J]. 城市问题,2012(1):22-25.
- [28] 杨振华. 新征程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逻辑依据、支撑要素与实践路径[J]. 观察与思考,2025(1):98-106.
- [29] 余仪.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五指山市巩固扶贫成果的路径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20):220-222.
- [30] 薛慧慧,陆风. 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3):10-17.
- [31] 温涛,田晓晖,龚斌磊,等.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实现路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颁布实施笔谈[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20.
- [32] 石金群.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目标、基础与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2024(11):60-74.
- [33] 张松涛,陈员森,王革委.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堰门镇瑞金村:党建引领助力归雁经济蓬勃发展[N]. 农业科技报,2022-09-21(3).
- [34] 曾祥明,徐华晴.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功能、难点与优化[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18-26.
- [35] 李重,毛丽霞.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发展的百年探索和基本经验[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9-57.
- [36] 张三元. 坚持自我革命: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推动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1-65.
- [37]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7.
- [38] 张一哈. 找回群众: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与运作逻辑[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51-160.
- [39] 曹军辉,张紧跟. 重塑乡村公共性: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以湖南省沙洲村为例[J]. 探索,2024(2):73-85.
- [40] 文丰安,陈明月.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245-259.
- [41] 冯富帅. 以人民为中心优化乡村治理[J]. 人民论坛,2019(20):64-65.
- [42] 帖伟芝.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历史演进、制度特征与实践进路[J]. 河南社会科学,2024(7):48-55.
- [43] 周卉,阙天舒. 数智赋能中国粮食安全治理:“整体性—技术性”的双重逻辑[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183-192.
- [44] 文丰安. 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 中国流通经济,2025(1):39-49.
- [45] 曹红. 乡村振兴中农民收入结构与增长探析[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48-57.
- [46] 曹雪,程辉,商屹,等. 基于“人—地—业”体系的城乡融合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7):810-818.
- [47] 卢俊阳,邓爱民.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与社会支持研究[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51-60.
- [48] 胡卫卫,杨文霞.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基层伪创新行为的生成与矫正[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2-31.
- [49] 文丰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演进与实践路径[J]. 学习与探索,2023(7):70-79.

责任编辑 韩云波 柳为易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